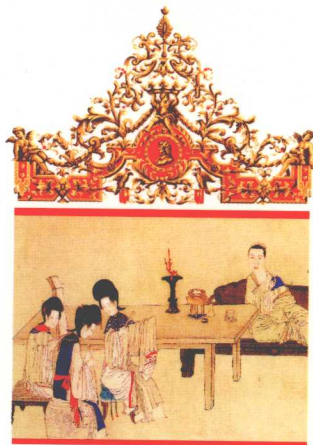




——| 中国文学知识 大课堂 |——

ZhongguoWenxueZhishiDAKETANG



萧 枫·主编

当代文学演进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

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

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辽海出版社

1102729

中国文学知识大课堂第二讲

当代文学演进

萧 枫 主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02729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当代小说

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小说	(1)
柳青的《创业史》	(3)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4)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6)
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9)
杨沫的《青春之歌》	(10)
宗璞的《红豆》	(12)
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	(13)
姚雪垠的《李自成》	(14)
王蒙的《春之声》	(16)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18)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20)
余华的《活着》	(23)

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	(25)
汪曾祺的《受戒》	(28)
阿城的《棋王》	(30)
韩少功的《爸爸爸》	(32)
王安忆的《小鲍庄》	(34)
莫言的“红高粱系列”	(36)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	(39)
陈染的《私人生活》	(41)
张贤亮的《绿化树》	(46)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48)
张炜的《古船》	(50)
陈忠实的《白鹿原》	(53)

当代诗歌

抒情诗和政治抒情诗	(54)
叙事诗	(68)
“新民歌”和“天安门诗歌”	(74)
“归来者”之歌	(79)
“朦胧诗”	(89)
“新生代诗”	(95)

当代散文

杨朔的散文	(99)
刘白羽的散文	(104)

秦牧的散文	(108)
《从文家书》	(112)
魏巍的志愿军题材报告文学	(119)
徐迟的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	(122)
巴金的散文	(124)
孙犁的散文	(128)
张中行的散文	(131)
汪曾祺的散文	(133)
余秋雨的散文	(135)

当代小说

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小说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早年即对民间文艺产生强烈兴趣。40年代创作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成为当时文艺界贯彻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典型。建国后创作有长篇《三里湾》、《灵泉洞》（上），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等。“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赵树理的小说借鉴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说白念诵”和“宣讲口气”，主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写，注重从描写对象的“文化思想”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所塑造的人物并不是时代所积极倡导颂扬的光芒四射的新时代的英雄，而是一些小人物的朴素、日常的方方面面。特别擅长刻画农村中一些具有小毛小病的“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赵树理也是延安作家中比较早地自觉关注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与农民思想实际、生活状况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的作家。这种关注与他富有个性和生活气息的语言风格一道，突显出了赵树理小说文本的时代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

“山药蛋派”是以赵树理为代表，部分艺术风格、审美追求相互接近的山西作家所构成的一个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文学流派。除赵树理外，主要成员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

正等。其代表性的小说作品有《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三年早知道》（马烽）、《宋老大进城》（西戎）、《老长工》（束为）、《奇异的离婚故事》（孙谦）、《七月的庙会》（胡正）等。

“山药蛋派”的文学理论起源于四十年代赵树理组织的通俗文化研究会以及集体撰写的《“通俗化”引论》。它所提出的“文化大众化”和“新启蒙”的思想主张，成为这些作家自觉的艺术实践的旨归。“山药蛋派”的写作在五六十年代形成具有全国影响的流派风格。其主要特色是围绕正在发生变革的农村生活和变革中所出现的新人物（既有先进人物，也有中间人物和后进人物）、新思想、新问题来展开的。注意在农村政策和现实缝隙之间，寻找人物和主题的叙述可能；小说大多具有大众化、日常生活化和地方特色；语言注重口语化，貌似朴拙而又略带诙谐；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新时代的农民形象。

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工作。1938年到延安并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完成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建国后从北京回到陕西，在皇甫村安家落户，先后长达14年。其间先后有短篇、中篇小说发表。1959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标志着作者思想和艺术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创业史》是一部在艺术上自觉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时代生活道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小说原计划写四部，随着“文革”的到来，柳青受到强烈冲击，小说写作计划被迫中断。

小说（第一部）围绕着梁生宝互助组的成立、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深刻而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艺术地展示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种类型的农民心理的生长变迁，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创造性地塑造了梁三老汉、合作社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等人物形象。由此，小说通过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各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这也是这部小说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大原因。

在题材处理上，小说注重并达到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的统一；在人物描写上，小说将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艺术视野开阔、人物形象厚重丰满；在结构布局上，“题叙”与“结局”匠心独运，颇具特色，通过组织各种矛盾、展开斗争来推进人物和故事。总体而言，《创业史》被认为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杜鹏程（1921—1991），陕西韩城人。从小家境贫寒。抗战爆发后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后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和延安大学学习，并从事过基层干部、随军记者、报社主编等工作。全国解放后，杜鹏程以自己做战地记者时所积累的素材为背景，创作了描写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保卫战这一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历史长篇《保卫延安》，塑造了革命军队中一系列指战员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在塑造战争的最高指挥者方面，小说第一次正面描写了彭德怀，为后来的文学作品尝试描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50年代以后，杜鹏程还创作了《在和平的日子》、《延安人》、《夜走灵官峡》等作品。60年代之后，杜鹏程受到残酷迫害，作品也遭到查禁批判。“文革”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里程》，《保卫延安》也于1979年重新出版。

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艺术地再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在西北战场所开展的延安保卫战，具有一种“迫人的鼓舞力量”。作品热情地歌颂了党、人民军队和军队的指挥者，塑造了周大勇等人民子弟兵的英雄形象，从一个角度历史地阐明了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

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

小说出版后，曾经为《保卫延安》的修改出版给予过密切关注支持的冯雪峰专门撰写了一篇评论《论〈保卫延安〉》。这篇评论指出，“以这部作品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认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1918—1970），浙江湖州人。30年代参加革命，建国后曾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解放后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中篇小说《锻炼》，短篇小说《识字的故事》、《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这些作品，因为其诚恳朴实的风格、富有新意的叙述语言、对人物形象的尝试性探索而受到当时读者的注意、欢迎。不久，这些作品，特别是曾经被拍成电影的《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51年6月，《人民日报》公开指出了萧也牧作品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归结起来有三点：其一，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歪曲了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政策；其二，丑化了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干部；其三，散布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情调，“美化、歌颂了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萧也牧的这些作品不仅直面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差异甚至矛盾，同时还及时地提出了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自我改造和提升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

《我们夫妇之间》描写了一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夫妇进城后在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新矛盾，通过生活琐事和日常矛盾，刻画了女工人干部张同志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但是，这个人物又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特别是缺乏具有文化修养的生活习惯。作者试图从新的视角来概括描写生活的新的面貌和现实，塑造新的环境条件下的典型人物和人物关系。遗憾的是，作者直面生活现实、从新的角度塑造刻画人物形象的努力被认为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相矛盾，相背离，并因此而遭到不公共的时待。

孙犁的《铁木前传》、《风云初记》

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县人。初高中时期就开始写作，并有作品在《大公报》发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家乡参加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这一时期发表了一些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40年代中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初步确立了孙犁小说清新涵泳的艺术风格，艺术技巧也日趋成熟。直至去世，孙犁的写作生涯长达75年。其间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八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十种散文集传世。去世前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孙犁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早期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进展，成为公认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又一高峰，他的散文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语言和表现手段的炉火纯青，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铁木前传》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时代背景，描述了两个老人（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和两个青年（九儿和六儿）在解放前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交好与交恶。小说以人际关系的前后变化为线索，以孙犁一贯关注的乡土人性在不同背景下的发展

为主题，在正面肯定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时，注意人物的真实情感的挖掘，流露出作家对北方农村人情美、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小说人物形象朴实鲜明，笔调明丽流畅，是这一时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文学作品。

《风云初记》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孙犁熟悉的冀中平原五龙堂为背景，通过抗日战争第一年发生在这个地区的故事的描写，集中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的风云变幻，以及战争背景下、进程中各种人物心理世界的变化和革命力量的成长，赞颂了人民发自内心的解放精神，塑造了高四海、芒种、吴春儿、蒋裕儿等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孙犁的小说善于在浓郁的地方风情的背景上展示人性；将时代风云与北方农民革命的自觉性和解放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人物鲜活清新；不以情节曲折见长，却以极俭省的笔墨，抒发浓郁的诗情画意。

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罗广斌（1924—1967），四川成都人。40年代到云南求学并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九月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在狱中与其他狱友一道坚持斗争。重庆解放前夕越狱成功。解放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1950年根据自己在狱中亲身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与杨益言合著），1958年又创作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与杨益言合著）。1961年与杨益言合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

杨益言（1925— ），江苏武进县人。40年代在同济大学读书，后因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越狱成功。解放后在重庆市委工作。

长篇小说《红岩》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代表，特别是它艺术地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齐晓轩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这些形象，不仅丰富了当代小说人物的长廊，而且长久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它所高扬的革命者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和高风亮节，成为一个时代道德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通过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中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坚决斗争，不仅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也反映了整个解放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形势。

小说虽然是以真实的个人经历为背景，但在艺术上并未刻意追求惊险离奇故事情节，而是始终围绕人物形象的塑造，注意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感受、行为动机和内在的思想感情，成功地展示了烈士们崇高的精神世界。

杨沫的《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因为家庭原因而较早走上社会，先后做过小学教师、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并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妇女、宣传等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文艺增刊主编等。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

杨沫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解放前以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为主。1958年发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后来还创作了长篇三部曲《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并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杨沫小说选》；散文集《杨沫散文选》、《大河与浪花》、《自白——我的日记》等。

《青春之歌》是杨沫最重要的作品。它所反映的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党所领导的北方学生运动。小说通过卢嘉川、江华、林红等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告诉人们曾经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他们的理想、革命事业和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所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较之过去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发展。小说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和成长经历，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这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等迥然不同，这也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小说将人物置身于时代洪流当中，能够将宏大的时代叙事与

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起来，结构气魄宏伟，情节也比较生动，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也比较真实细腻。但在作者所致力揭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方面，小说并非没有不足。首先，小说仅以小知识分子为主要探讨和表现的对象；其次，小说的“探讨”意味似乎也并不浓厚。还有人认为小说“后半部结构比较松散，语言不够丰富多彩，人物的对话缺乏个性”等。

宗璞的《红豆》

宗璞（1928—），祖籍河南唐河县，生于北京。抗战时期在昆明上小学、中学。抗战胜利后随父亲执教的北京大学一起回到北京。后入天津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50年代初大学毕业，先后在全国文联、《文艺报》等工作。1957年7月，小说《红豆》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很快小说遭到批判，认为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和爱情观。除《红豆》外，宗璞还有《桃园女儿嫁富谷》、《不沉的湖》、《弦上的梦》、《我是谁》、《鲁鲁》、《三生石》以及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和第二部《东藏记》。

小说《红豆》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前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作为小说，《红豆》在50年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突破“工农兵”题材为主的藩篱，不仅正面描写表现了大学生知识分子，而且还突破“爱情”禁区，颇为“温情”地表现了年轻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和选择成功后的欢乐”。作品在刻画人物上，没有落入当时“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的俗套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无论是对江玫还是学生运动领袖萧素的描写，都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所描写的主人公的那些生活场面细节，如林荫小道上的漫步、校园花丛中的情话、象征爱情的“红豆”、因为政治信念见解不同而引发的争吵等，不仅真实地、符合历史实际地层示了人物心理发展的轨迹，而且，在后来一个人物形象不断被抽去生活真实和“假大空”的时代，这些细节和形象也让人觉得可信和温馨。